

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接力耕耘六十余载,让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越来越丰硕,目前正在还原近3800年前的夏都风貌——

# 夏都二里头 面孔渐清晰



专业钻探队进行系统钻探

## 3 多学科共同参与, 将还原夏都风貌

近日,在二里头村的一块田地里,只见十几名钻探队队员手持洛阳铲,在田地里进行系统钻探。本报曾报道过的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农民技师王从苗正在对洛阳铲带上来的泥土进行仔细辨认,她根据泥土的颜色、构成及混杂的陶片,推断着地层的年代和性质。

在另一处农田里,今年57岁的王宏章正带着同为考古队队员的儿子王飞采集数据。从1984年开始,王宏章已经当了36年的考古技师。至今让他难以忘记的考古经历,是2002年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出土后,他开车奔波一整天将这一国宝连带着整体发掘的墓葬运送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这样的故事王宏章能讲很多,他掌握着一手绝活,虽然干的活儿看起来也只是和泥土打交道,但他做的是一件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经过多年研究,专家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梗概式描述,其中提到距今近3800年,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赵海涛说,如今的考古工作更像综合学科,物理学、生物学、植物学等十几个学科共同参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正在还原当时夏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全貌。

因此,赵海涛认为,相较于过去的考古工作大多是物质文化研究,现在的考古工作已经进入新的形态,尤其是延伸出的保护和利用的职能,已经进入展示、传播,以及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平台,进而达到考古的最终目的——传承,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里头遗址考古60多年,初期只是发掘研究,现在已经形成边发现、边研究、边保护、边利用、边传承的‘五位一体’。”

夏朝,这一史书中记载的第一王朝,随着二里头遗址的深入发掘和保护,面孔已越来越清晰。

□记者 李砺瑾 文/图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这句话。2000多年后,有一群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二里头的遗址上接力耕耘六十余载,从源头上验证着他所书非虚。在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终极哲学问题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曾用“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对距今近3800年、中原地区的这一文明形态进行精准定位。近日,记者走进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走近这里的考古工作者,听他们讲述发生在这片河洛大地上的故事。



## 2 “二里头夏都说”,几成史学界共识

颇具戏剧性的是,徐旭生在发现二里头遗址后,却认为这里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大。此后20年,史学界也倾向于二里头是商代都城。

1977年,北京大学学者邹衡抛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198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考古队在洛阳偃师尸乡沟一带进行考古勘探时,发现了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并判断其可能是汤都西亳,这一遗址恰好是在3600多年前二里头即将废弃时兴建的。

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是夏都,偃师商城遗址才是商汤灭夏后建立的西亳城。至于二里头为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夏都有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发现成熟的文字。目前一般认为殷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很多刻画符号,如果你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这些与殷墟甲骨文相似或相

同的符号,尽管它们能否被称为文字还有争议,但可以认为它们是文字的前身。

“比较充足的证据链条使二里头遗址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对程度极高,因此证伪的难度更大。”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如果说文字记载着文明,那么文字出现之前的文明又是怎样的呢?二里头的一件件出土文物如同“沉默的证人”,让考古的过程如同破案,指向一个个结论。

如今,“二里头夏都说”几成史学界共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王巍2018年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一句很直观的话:“中国如果一共有100个考古学家,95个应该这样想。”

去年10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无数中外游客看到60余年来几代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能够展示夏朝社会发展的文物,并沉浸在这本立体丰富的夏文化历史书中。

## 1 为寻找夏都,找到了二里头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的北侧,是偃师市翟镇镇二里头村的一处文化广场,广场的一隅有个不起眼的小院子,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的办公地。61年来,三代考古工作者接力发掘,让一座原本掩埋在黄土下的夏朝都邑重见天日。

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并非偶然,她自从发现之初,便和“夏”字密不可分。1959年4月的一天,71岁高龄的史学家徐旭生带着助手从北京出发,此行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寻找“华夏第一王都”。

此前几十年,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通过二重证据法,释读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中所载的商王朝为信史,并得出“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经过前期对文献的梳理,徐旭生认为豫西和晋南这两个区域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洛阳盆地便是重要的考察地。他和团队成员在豫西考察发现20余处遗址及自仰韶时期至汉代的陶片、石器 etc 等遗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二里头遗址。这处遗址呈现的并不晚于殷商早期的繁荣文化和广大的范围让他十分惊讶,发出“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的感慨。1959年秋,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进驻二里头遗址发掘,后来发掘工作由后者独立承担。



考古工作者现场辨认钻探土样